

車敏騫三部曲

薄一波題



自传
诗作
书法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回忆、企盼和感谢

人生九十，可谓长寿，回首往事，又似须臾之间！

那偏僻而小小的沅岭村，那涛涛的黄河，那艰苦步行10天、960里北上太原之路，以及我的父母和老师、亲友……儿时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铭刻得那么鲜明！

还有我的母校——山西太原国民师范，那寒窗苦读的日日夜夜，那培养我网球球技的球场，迫使我离开太原的“西操场事件”……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中闪现。

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我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而后奋战太行山，挺进大西北，进军大西南，又赴朝抗美，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我勇往直前，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人世间的变化难以预料：青年时代我携笔从戎，在战火中成长，之后又卸甲从文。无论在第一军医大学、北京中医研究院、吉林医科大学，还是东北师范大学，都流淌过我辛勤的汗水。

经历长期的革命与战争生活，我没有坐过牢，没有负过伤，却在“文革”中，被监禁了7年，5根肋骨被打断！这大概算是一种“补课”吧。我个人无怨无悔，却希望我们大家永远不要忘记这场浩劫。

从吉林省政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本该颐养天年，但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为了反腐败，我仍然本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奋斗不息，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总的来说，我在过去的岁月中是尽了力的，为党为人民做了些好事，但也犯过错误，在总结经验中不断前进。我是一个很执著的人，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屈服过。这种精神使我奋斗至今。

我爱好读书，手不释卷；我还爱好网球、台球、游泳、作诗、书法。我热爱生活，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事物啊！

人终归有要见马克思的时候，我用这部书给人们留下我的回忆，留下那个

2 车敏瞧三部曲/自传

烽火连天时代一个出身于山西偏远村落农民儿子的经历。

遗憾的是，由于游动不定的战争生活，特别是“文革”的破坏，我的许多资料散失了，许多照片也被红卫兵烧掉了。因此在传记方面特别是30年代和战争年代部分，未能充实更多的具体资料；又由于精力所限，有些部分阐述得不够充分。

今年的农历三月初十，是我90岁的生日。不知为什么，越临近这一天，我的心情就越激动。当前国家的发展日新月异，“三个代表”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同时又面临诸多问题，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还能给祖国人民做些什么呢？唐诗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将尽力而为，更期望年轻一代大大超越我们，“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振兴中华，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将依靠你们一代一代地去完成！你们站在我们用血汗和生命筑造的地基上，理应建成壮丽的大厦；你们又要在探索中前进，只有牢记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付出比我们更多的智慧和劳苦，才能穿越崎岖的道路，获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感谢我的妻子韩慧娴，她为我做的太多了，没有她的鼓励和帮助，我不可能做出应有的成绩的。

感谢老领导、老校友薄一波同志为本书题名。

这部书之所以称为“三部曲”，是因为它包括自传、诗作、书法3个部分。

从1997年起我就着手写这部书稿，后因病多次停笔。在2001年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才完成了这项工作。

感谢许多帮助我完成本书稿写作的同志，特别是莽东鸿为全书统稿，还有周敬思、裴振基、赵连盛、刘仁学、周毓芳、洪敬辉、巨建国、李振兴、柳泓洁、金昕等同志为本书的审稿、出版，付出了许多劳动。

从吉林省军区顾问岗位离休的吴殿甲同志，是我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战友，他为自传中的抗日战争部分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和建议，我在此向他表示特别的谢意。

感谢东北师大党委对本书写作的关心和大力支持。感谢东北师大出版社为出版本书所作的努力。

作 者

2002年农历元月初五

第一部 自 传

- 第一章 晋南山乡的弄潮儿 刻苦求学
- 第二章 背井离乡 踏上革命征程
- 第三章 从事新运 抗日救亡
- 第四章 携笔从戎 投身武装抗日
- 第五章 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 第六章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 第七章 尊师爱教 积极贯彻党的医学教育与科研方针
- 第八章 在东北师范大学“伏枥”的八年
- 第九章 吉林省政协工作片断
- 第十章 离休以后的十五年
- 附 录

第一章

晋南山乡的弄潮儿 刻苦求学 (1912—1928年)

黄河北岸的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沅岭村，一个仅有70多农户人家的古老村落，背靠凤凰岭，东临沅水河，南有中条山，北有历山，出门可望见河南省的青岚黛嵋山，夜静可以听见黄河的怒吼声，每逢初一、十五的早晚，还可听到从40里之遥的同善镇传来的古刹钟声。——1912年农历三月初十，我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17岁前我生活在这里，我很热爱这块土地和这里的父老兄弟、亲戚、朋友。由于历史和工作原因，故乡垣曲县还成为我革命活动的一块宝地，因而我对它的热爱，绝不是一般的乡情所能概括得了的。

我的乳名叫“过兵”，来自于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家乡地处兵家必争之地。我参加革命以后，热爱武装，一干就是20年，深感童年乳名有“兵”一字，很是荣幸。

我的学名叫国宝，1935年改为现名；晚年号铁叟。白区工作时，曾以戈比、平中、子平等化名写过多篇短文。祖父车松，清朝贡生，去世很早。祖母石氏，是光绪三年大旱之年逃难过来的人，她常给我讲些当年如何度过特大饥荒包括人吃人的故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的父亲车锡祥，目不识丁，用钱捐了个童生学位，他为人正派，助人为乐，虽不识字，但很有智谋，人们称他为“小诸葛”，也成为当时的村长车锡文的“参谋长”。因为他很会讲道理，凡村民家庭和邻里之间的纠纷，经他一调解，就解决了。我村有一个懒汉叫毛庚，游手好闲，单靠偷别人庄稼为生，人们说他虽是个好人，就是懒，不劳动，我父亲对他采取了帮助加教育的办法，终于把他转变成一个完全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全村传为美谈。一次，在夏收临近之际，幼小的我拿着破农具，到村中从河南省来的修理工处修理。不巧，正值那个人收拾行装要走，当他知道我是车锡祥的孩子，便立即生火修理，还说：“我能在这里住下，你爸帮了我多大忙呀！”我在本县高小读书的时候，父亲几

次鼓励我说：“你努力学习，成绩好了，将来可以送你到省城太原上学念书。”这些勉励的话，对于我当时的勤奋学习和两次不怕艰难步行到太原求学，都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兄车国英于1938年日寇侵占垣曲后被拉夫，死于大同煤矿；母亲和我的前妻杨秀坦同年亦死于战祸；全家房屋先后被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焚烧。这些民族恨、阶级仇，都不能不直接影响到我和我所有的亲人。

我结婚两次。前妻杨秀坦生一子一女，长子车清远，二女车玉梅。1945年续弦，妻子韩慧娴，她忠厚善良，平易近人，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生两男三女：长子车向新，次子车向远；大女车军（苏菲），二女车苏妮，幼女车英妮。我共有7个孩子，加上孙辈，已成为一个有40多口人的大家庭了。

我天资平平，智力发展较晚，六七岁的时候方能连贯起来数一百个数字，因此，怕念书，怕背书，常因背不过书而逃学，挨手板。可我不服气。随着年龄的增长，约在10岁左右，我开始懂事，脑子里渐渐出现一大堆问题，如泥塑的土地爷、马王爷、财神爷，一不吃饭，二不会动，可为什么人们还信它为神呢？算卦先生的那些花言巧语，可信吗？为什么硬把女人的脚缠得小小的，不能走路，这是怎么回事呀？在家中，我对父母逼着妹妹缠脚很不满意，与妹妹联合起来同父母作“斗争”，结果妹妹未缠脚，现在80多岁还可以干农活。随着对社会的了解，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上有的人很穷，有的人很富，而且好吃懒做的人富，辛勤劳动的人反而很穷。封建迷信及宗法伦理等阻碍社会进步的现象，都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至于什么是大官僚、大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我是在参加革命以后才一步一步知道和理解了的。

20年代初，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熊熊烈火燃烧到我的家乡，在孩子群中，我带头反对封建迷信，推倒了村子里的各种泥菩萨，唱“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等革命歌曲，参加村里打倒土豪、劣绅，主张妇女解放的活动。有一次，我趁老师不在校的时候，戴上墨镜，拄着文明棍，闹出一桩佯装政府查脚委员冲进民屋查脚的恶作剧，受到老师和父亲的严厉责备。我的脑子像一张白纸，除了“革命”，打倒这个，推翻那个，什么也没有。当时虽说我还不懂得什么叫真正的革命，但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我从记事的时候起就跟父亲在黄土地里打土坷垃，放牛，割草，犁地，间苗，割麦，栽棉花，从开始做轻活到后来干重活，都可以干，也喜欢干，可以算作小半个劳动力，很多农业原始的耕种技术，也还是在那时学会的。我对农业很感兴趣，对农民更有感情。父母亲都不识字，谈不到什么幼儿教育，但父

母的言行对我的影响却很大。

当我十几岁以后，就一股劲儿地钻进读书和写字的活动中了。

我上的是半农半读的小学校。严师是我的伯父车锡文，他是清朝生员，古学深厚，善诗文、书法，是当地一位很受人尊敬的老先生。由于采取半农半读，即忙时种地，闲时读书的办法，实际学习时间大约四五年，但我学习刻苦，通过努力依然念完了《四书》、《诗经》、《幼学》、《古文观止》，并能背诵数十篇古文；初步学会了古汉语，初步懂得了爱国主义和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文化与思想基础。

我从小就热爱生活，在村子的泥塘里学会了游泳，横渡过黄河。我热爱黄土地，长大后更热爱大海，老年曾多次到海中游泳。我喜欢打拳，如黄拳、白拳、猴拳，都打得很熟，在县区拳术比赛时得过奖。外祖父赵玉玺是个武进士、拳术家，曾用气功顶断过一个无赖的肩膀。我相信气功，喜欢音乐、唱歌，幼年就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因为我幼年在小学学习较好，1926年14岁的时候，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垣曲县第一高小。在高小，我非常刻苦地读了两年，礼拜天也不回家，比别人用在学习上的时间超过一倍还多，我相信“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的道理，埋头苦学，所以我的作文在全校经常贴榜，作为示范。1928年高小毕业时，我一心一意要投考山西省太原国民师范或山西第一师范，因为这两个学校是公费学校，能读得起。

我怀念故乡，更怀念逝去的亲人。1998年1月，我患急性阑尾炎住院治疗，手术后又患严重支气管肺炎，心律失常，心衰。医院给家属发了病危通知。1月4日上午9时左右，我脉速每分钟150—200次且不规律。当时在场的医生有内科专家郭新、外科专家谭毓全，正巧此时东北师大党委书记周敬思、校长王荣顺等同志也来看我。我的脑子仍很清楚，看到大家的紧张表情和自己脉速这么快等现象，觉得自己临死的时刻到了。随即，我平时想的几句临终留言，脱口而出：“大数已尽上天去，晋谒邓毛马克思。我不算个好学生，临终仍莫忘学习。车敏瞻临终遗言1998年1月4日。”守护我的孙女车观棉记录下来，即当作临终遗言。当我说了以上几句话以后，大家都强笑着安慰我说：“不会不会，你的命大。”（命运还是听了大家的话，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又多活了4年。）

接着，我想到好像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向生我育我的老人们、亲人们怎么告别，具体地说就是写一篇告别祭文。这样，我在床上说，孙女车观棉作了记录。当年清明节扫墓时，我在老家的大儿子车清远（2001年病逝，终

年70岁),代我在老人墓前,将祭文读后焚之,这才算是了却了我的心愿。祭文全文如下。

亲爱的奶奶、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大哥、大嫂及前妻秀坦,还有教育我多年的老师、伯父车锡文:

我现在回来了,带来了一点薄礼向你们做最后的告别。记得1947年夏,我曾与续弦韩慧娴回来与你们见过一面,后来又回来过几次,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再来拜见。此次迁坟,本应我亲自回来照料,终因年迈多病,实难行走,只好备薄礼托儿清远向你们告别了。

奶奶爸妈哥嫂及老师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永生不忘。回想起几十年的人生路程,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童,逐渐成长为一个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革命者,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打败了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新中国成立后又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之中,直至今日,仍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关心着党的事业。我没有辜负你们对我的教育和期望,不愧为你们的好后代。由于战争的原因,你们都过早地过世了。前妻1938年去世,她所生的清远和玉梅,两个孩子都很好。我和韩慧娴1945年于延安结婚,她是一个朴实、善良的好妻子,生有二男三女:向新、苏菲、苏妮、向远、英妮,他们也已长大成人。孩子们都继承了祖辈正直善良、勤劳、朴实的品质。

我已离故土60余年,我非常想念你们,想念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随着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发展,家乡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为了建设小浪底水库,彻底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要将你们的坟迁移,若你们地下有知,也会欣然同意的。

亲爱的奶奶爸妈哥姐秀坦及老师,我的身体不好,若有机会还望能回来拜见你们。千谢万谢奶奶父母和伯父之恩,兄嫂姐姐夫妻及老师之情。

1998年1月 车敏瞻顿首

前面谈及的对我影响很深刻的启蒙老师车锡文伯父,我也永远怀念他。我写过一篇文章《深切怀念我的老师——车锡文老先生》,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历史,都有它的继承性;同时又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这一代的革命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在某个早晨突然参加了什么共产主义学校而成为革命者的。相反,都是受了当时社会的、家庭的,特别是学校教育的影响,参加革命后又经过实践学习逐渐成为革命者的。我们这一代先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当年教育我们的老先生,当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先生,无不怀有深切的怀念之情。

车锡文老先生，生于1870年，卒于1939年。他是我的伯父，又是我的严师。人们当时都尊称他为“老先生”；他中年当过村长，人们也称他为“老村长”。我在他的教导下念了四五年书。时间虽能冲淡人们的记忆，但却永远冲不掉我对这位老先生的深切怀念。不仅我个人，凡是受过他教诲的人如车国士、车国光、王健、车敏等同志，谈起这位老先生来，无不示以怀念之情。这几年我还乡两次，见到本村或邻村的同辈老年人，也都称赞他，崇敬他。

车锡文老先生17岁时获得生员学位，后为增生，熟读四书五经，古学雄厚，当时县上请他出来当绅士，他拒绝了。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振兴教育，摆脱愚昧。他在自己的家里设立了一所半农半读的私塾，自己任教，使村上没钱上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由于他治学严谨，教学得法，除本村学生外，远方到他门下求学者络绎不绝，如胡村的王荷荣（王健）、东坡的李金龙、河底村的冯希参、峪子村的普晓明等人，真是“近者悦，远者来”，这在极端困难的旧社会里，是很少见的。他教学50多年，很少听说收什么学费，他只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而自乐和自慰，主要靠自己耕种以谋生。教学内容当然是“子曰学而时习之”、“四书五经”这一套了，但他在具体内容上还是有选择的。如讲《古文观止》时，多讲前后《出师表》、《滕王阁序》、《岳阳楼记》、《阿房宫赋》以及《苛政猛于虎》等，对其中具有民主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词句，更不厌其烦地给以讲解，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当益壮”，“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他也常给学生讲“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的故事。我5岁时，他就教我背唐诗，“春眠不觉晓”、“松下问童子”等200多首名句，这些都还是那个时候学的呢。当然，他的教育也有忠、孝、节、义等封建思想内容，由于历史的局限，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他教学态度非常认真，一字一句都讲解得非常透彻，一丝不苟，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作业一定要按时完成，否则，就受到责备甚至挨手板。我多次挨过手板，也曾因此逃过学。虽然这种教育方法有些是不足取的，而“严师出高徒”，50年的教学，确实培养出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中华民族优秀思想传统的人才，当革命形势到来之后，他们就捷足先登地投入革命，其中有黄埔军校毕业的车介凡，有武汉市委秘书长王健，有一机部机械学院院长车敏，有广东检察院院长车国士等多名我们党的中高级干部和曾经在当地教书多年的车兴周、车从龙，以及目前还在该县工作的车国光等同志。车锡文老先生用他一生的心血，将我们民族的文化工具——文字传给了我们，将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给了我们，将我们祖国历史上爱国主义和有益的民主思想传统传给了我们。我们这一批人能很快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革

命者，他老人家是有一份功劳的。

车锡文老先生不仅是个严师，他的诗才也很过人，常常是见景生情，出口成章。他写的一些通俗易懂的诗句，常为人们所念诵。他还擅长写状子。大家知道，在旧社会写状子往往是替富人辩解，颠倒黑白，欺压穷人的，但车锡文老先生正相反，首先看你有理没理，如有理，即是穷人，也要毫无报酬地一定帮助把官司打赢，如无理，再有钱有势也不给写，这类例子是很多的。他每给人写好状子以后总念给我们听，并经常说：“有理就有理，没理就没理，咱总不能说那昧着良心的话。”这对我们也是活的教育。很有趣的一件事，发生在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大逮捕时，实在说，他对共产党也并不赞成，但他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国民党大捕大杀的政策，是极端反对的。他在保释我县被捕共产党员申景达、台联杰而写的状子中，有这样几句：“民×××居于深山之中，异地并无相识，或被人陷害，未可知也”，措词婉转，说得有情有理，县长看了认为有道理，申、台2人随获释放。

车锡文老先生除在文学方面造诣极深外，书法也很好。尤善于写核桃大小的行草书，真是笔走龙蛇，蜚名远扬。他一生书写的碑匾很多，至今当地还留有他的墨迹。他教的学生车介凡、车国士、车国光等人都能写一手好字，也不能不归功于他老人家，我个人之爱好书法，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

车锡文老先生为人公正不阿，不谋私利，并能给百姓谋福利，深受群众爱戴，故从1918年起又兼任村长多年，几次上辞呈都辞不掉，当年较开明的任祖兰县长曾赠其条幅为“其言为坊，其行为表，有腹皆鼓，有口皆碑”。他为人谦逊，有时也很幽默。由于他教学有功，许多家长酝酿给他立碑，他总是谦逊地文绉绉地说：“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是诚有所不能也。”用以谢绝之。

车锡文老先生69年的一生中，教书就占了50年，可以说他的终生精力都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在那个社会环境中，却做出了这样不平凡的事。他的高贵品德和高尚情操，确实令人深切怀念，值得学习并发扬光大。像这样的老先生在我县是很多的，在全国各地也应该是很多的。如果说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作用的话，那么，像哺育我们成人的我们父辈一代老知识分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是同样也树有功勋的吗？对于这些人物和感人事迹，应当给以历史地位的。当然，由于受到历史的局限，他们在教学中以及各种社会活动中，封建的甚至迷信的带有糟粕的东西一定会有，这些应当放在当时的环境中去考察它，这是万万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第二章

背井离乡 踏上革命征程 (1928—1935年)

我上师范的目的是很简单明确的：想当教师。由此引出两次逃跑到太原读书的故事。第一次是1928年夏高小毕业后，因家母坚决不让我外出，我含着眼泪，背着母、兄，伙同几个同学，背上行李，昼行夜宿，还须自己起火做饭，每日行程近百里路，一步一步地走了960里路程，用十天时间到达了省会太原市。在太原，我第一次看见了火车、楼房、工厂等，开了眼界，觉得外边大城市和偏僻山村就是不一样，多好啊！但不幸的是，考国师（即山西省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下简称国师），头试虽得了第6名，二试却落榜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求学心切，不得已，我又不量力地考入了一所所谓的贵族式学校——太原成成中学，半年花了160元大洋，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啊。寒假回家后，卖地还了债，母兄哭着，怎么也不让我再去了。我自己也觉得真上不起中学。同母兄闹的结果，是允许我在家中备课半年，暑期再到太原考师范。我顶住了乡友对落榜生的白眼，1929年春在家中补习自己的薄弱课程——数学，白天晚上苦学，求人辅导，虽不是“悬梁刺股”，也是很辛苦的了，目的就是一个——上学，非考上省立师范学校不可。当时真有一股“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干劲。但是到了暑假考试日期，母兄仍执意不让我去，我只好含着眼泪第二次偷跑到太原。路仍是一步一步地走的，不以为苦。

天公不负有心人，我终于闯过了“五十取一”的难关，考入了国师。这一下算是如愿以偿了。

国师是山西军阀阎锡山办的一所培养教师的中等师范学校，学制6年，师资雄厚，设备齐全，伙食、住宿完全公费，个别家境特别困难的学生，节约一点还可以每月给家中寄一两块钱。正因为这样，考入的学生也多半是家境贫苦的农民子弟，当时太原就流传着这样的一首顺口溜：“国民师范，拉洋车子的一半。”它又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也是一座革命的熔炉，我党的很多

高级干部，如徐向前、程子华、薄一波、李雪峰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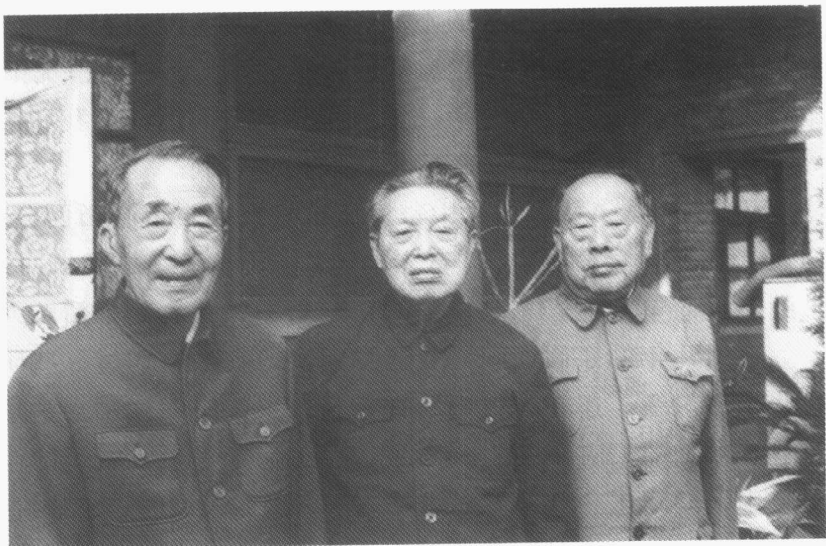
我入校第一年的上半年，除完成学业外，还特别爱上了打网球这项运动。热爱到什么程度，说起来难以使人相信，也难以形容。除在课外时间完全练球外，晚上只要有月光或微弱的灯光，我都会独自一个人拿上一堆破烂网球，在小网球场上，练习发球、高压球、点球。约20多个球，在这边打完后，再到那边捡起来，再往这边打，不断地练习发球、扣球、高压球的准确性，越练越有兴趣，后来人们就称我为“三点弹”。1930年上半年在学校的班级网球比赛中，我获得全校第一名，不仅轰动了全校，而且几乎在全太原市都出了名。那时，我球技较高，成为省队固定的代表，1933年参加了南京全运会，1934年又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并获得第二名。这个阶段的练球，给我的网球技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公不负有心人，直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我已75岁时，还能战胜四川和香港强手，全场观众为之赞叹！

尽管我如此热爱网球，但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的爱国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为了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工作，我3次像断烟瘾一样地摔坏了心爱的网球拍子。我在参加网球比赛的时候，也不忘革命和抗日。到南京参加全运会的时候，我受托从上海买回了一批马列主义书籍；参加华北运动会途经北平时，又参加了裴丽生同志召开的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垣曲乡友座谈会，畅谈了当前日寇侵华和我们应对的形势。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强占我东北进而侵略我全中国的九一八事变，这对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时我心中想的就是抗日，就是救国。学校中进步同学们议论的是这些，进步老师们讲的也是这些。但国民党反动当局对这些却视而不见，相反倒害怕学生抗日。不久太原市爆发了学生赶走山西省国民党省党部的运动，以及学生赶走反动校领导的群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我都是急先锋。从此，我基本上停止了网球活动，并由喜欢语文转为酷爱文艺。

我读了不少苏俄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小说，如《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等，有些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名称，现在还能记得起来。我特别爱读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后来简直成了鲁迅迷。我还参加了国师同学组织的九一八读书会 and 文艺研究社，教师如周化甫、张一林等（均为地下党员）多次给讲形势，作报告，这对我的教育很大。在文艺研究社出版的文艺刊物上，我以笔名戈比发表过一篇题为《上前线去》的文章，表达了一个青年（实际上就是我自己）投笔从戎、抗日救国的意向；还以同一笔名，在上海出版的《时代文化》刊物上，发表过一篇《出路在哪里》的短文。与此同时，我还

在垣曲同乡裴丽生（已是中共党员，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主编，王心清、姚藩南等同乡参加编辑，在北京创办的反帝反封建的《垣民之友》月刊上，以学名车国宝发表过3篇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榨人民的文章。但在此时，对于中国将来到底应是怎样的中国，社会到底应是怎样的社会，我仍然处于迷茫状态。这时，同学中开始秘密流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社会情况和中国工农红军斗争的故事。



同老战友裴丽生（曾任中科院副院长。中）、文敏生（曾任河南省省长、省委常务书记，邮电部部长。左一）合影。摄于1992年，北京。

我们都是垣曲老乡。裴丽生是我们长辈，大我们六七岁，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他创办的《垣民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了。1937年我从上海回到太原，在他家住了4个月，他待我如兄弟。文敏生原名维晋，他的奶妈是我的老嫂，幼年时我们一起玩，高小是同班同学。1936年他到上海我处，当年9月离沪，潜入豫南苏区，参加红军。

1933年夏季，我从进步同学苏国太手中得到《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叛徒考茨基》、《列宁主义基础》等几本著作，如获至宝。我躲在网球场一个工人住的小房间，每晚在小煤油灯下读至深夜。我这才算是开了眼界。对照当时的社会现象一思考，一分析，啊，原来社会就是这么回事，有阶级，有阶级斗争；国家这个机器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原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对列宁著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我特别感兴趣，还写了很多笔记。从这些书上，我知道了人类社会一定要发展，将来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那时阶级没有了，穷人没有了，真正做到人人平等，共同幸福，多美好啊！苏联现在就在做这件事，中国共产党也在做这件事，各国共产党都在做这件事。作为一个天真的热血青年，思想上是一个飞跃，为我确立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奠定了初步基础。从此，我分析社会现象，看一个人的家庭出身、生活，也有了个标准。我参加学校各种革命活动更加主动更加积极了。

随着日寇对华北地区的不断进犯，当时蒋介石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加紧了对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控制和镇压。在此情况下，1934年太原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对会考、争取抗日自由的运动。我和同学们一道，上街示威游行，赶走了反动的教育厅长，取得了胜利。

我于1934年秋参加“中华民族抗日武装自卫会山西分会”，参加这个组织的还有国师同学乔明甫、许奇之同志。相继我又参加了山西太原世界语协会，已学到能够简单会话。总之，当时在同学中，我算是个活跃人物。

在这几年的寒假期间，我还乡四次，在乡村作过一些阶级调查，利用年关写些革命对联。还在本村同龄青年亲友中，组织读书会、形势报告会等，讲解形势，参加的人有车国土、车平达、王荷荣等，古城镇的有文维晋（后改名为文敏生）、车小广、姚生麟、姚舜基等。我在太原时，经常给他们寄些进步刊物。老家农村成为我当时搞革命的一块宝地。春播秋实，以上这些同志后来都先后参加了革命，有的还成为我党的中高级干部。不仅如此，还经过他们，带出来一批青年上了太行

山，参加了抗日和革命，如鲁挺同志，就是王荷荣带出来的，还有文如、王勉、陕震等20多人，都是这样出来参加抗日和革命的。在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35年一个夜晚，村东官道旁的土墙上，突然出现了“热烈欢迎共产党到垣曲来”的大标语，这在当时是多么怕人的标语啊！第二天村长就传出话说：“咱村有了共产党。”后来



同李雪峰（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原太行区党委书记。前中）、梁文英（曾任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法学会顾问。左一）在太原市参观。摄于1993年。

我们3人都是30年代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校的老同学。我和梁文英还是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同学。1933年我们共同创办了《文艺》刊物，上面刊登有我的短文《到前线去》。李雪峰是国师教育学院学生，他在进步同学中威信很高，历次学生运动都是他参加指挥的。

才知道，这是反动村长玩的逼我早日离开家乡的一幕丑剧。

1934年寒假，我以《垣民之友》刊物为中心，展开宣传，参加的人有城内姚舜基、王采义、姚生林等人，这就热闹多了。《垣曲之友》很受小学教员的欢迎，我和在太原国民师范学习的李安心、王丁末等人，是当然的宣传员。寒假期间，我们在垣曲县城关，组织宣传它，以扩大影响，同时，还组织了各种调查会，了解社情民意，利用家乡关系，逐渐把革命火种引向故土。

寒假期间，我在家中收到同学王观潮的来信，他说太原白色恐怖严重，回校时应注意。1935年春返校，得知同学中有被捕的，有被迫离校的，和我亲近的同学告诉我，反动当局已准备在国师逮捕我和其他几个同学。其实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初生之犊，抓我干什么呀，只能说明反动当局对革命的恐惧。

1935年3月一个礼拜天的下午2时左右，我和同乡席丙午、常芝英（共产党员）在国师西操场打网球。当场有一名约30多岁又胖又高的侦探在旁边盯着，我看出这个家伙是个坏蛋，就用世界语说“li estas aculo”（这人是坏蛋），互通了情报，过了一会儿，那个人不见了，我们停止了打球，企图甩掉这个侦探。但当我们3人从西操场走出来的时候，那个家伙却在门旁站着，并大声叫喊：“车国宝、车国宝。”我当时很沉着，当作不是叫我，等我们3人行至大道中间时，席、常2人突然举起球拍挡住那个坏蛋说：“你叫他干什么，你认识他？狗东西！”我趁机迈大步跑进国民师范西门内，得以脱险。这就是所谓西操场脱险事件。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掩护，否则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曾作诗一首，题为“最难忘的一天——忆昔寄席丙午同志^①”：

戏球西操场，时值三月中。
掩护闹革命，球拍不放松。
春日暖融融，狂犬乱嗡嗡。
它是“啊秋老”^②，“世语”通音情。
走出西校门，旁站一狗熊。
目瞪如灯泡，直呼“国宝”名。
心中有底数，不答亦不惊。
左有丙午弟，右有芝英兄^③。
稳步向前走，护我中间行。
何时相识“国宝”君！？狗贼喊他为何情！？
常、席持拍追敌探，鹰犬夹尾口无声。
智勇斗敌传佳话，胜利脱险网罗中。
由此我才转平安，奋斗终生有今天。

此情此景最难忘，救命之恩大无边。

转眼已过五十年，天长地久情更浓。

忆往昔，思今朝，多少血肉换旧朝，

书此非敢为史记，与君共作同慰情。

（注：①席丙午，现年88岁，居住在上海。②世界语译音，坏蛋之意。③常芝英后改名为张惠敏，1939年在延安“陕公”任教，1944年病故。）

西操场事件发生以后，我就改名为敏瞧。1958年夏，康生来长春视察第一军医大学时，问我：“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答：“因为我政治上很迟钝，这样可以惕厉自己。”人的名字只是个符号，但它又可以起到启迪作用。“敏瞧”这个名字，就是惕厉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并能灵活地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来。

脱险后怎么办，我有家不能回，又无职业，即使有职业也不能公开露面。我要继续闹革命，后经与张惠敏同志商量，他决定介绍我到上海。我高兴极了。不久，就在一个晚间，我化装成小商人，乘火车到石家庄转平汉线。因为当时到上海的介绍信尚未拿到，便先到河南确山我的朋友文维晋（文敏生）处，他当时任确山县县长席福五的秘书。席是留日学生，垣曲老乡，文化程度很低，但很勇敢，国民党当局就派他到这个离我们豫南和湖北交界处的红军游击区不远的确山县，进行“剿匪”。这时，文维晋已与红军游击队取得秘密联系。

我在此处住了半个月，等介绍信来到后，我便乘车到汉口，转程经南京直达上海郊外大磨厂的一个私人小养鸭厂。养鸭厂厂主姓陈，四川人，矮个子，一口四川话，不问政治，只管养鸭赚钱。厂里还有来自广东的两个青年知识分子，其中一个叫叶吉浓的，广东惠阳人，谈起政治来似乎还有点兴趣。另外，还有一个专门打鱼草给鸭子吃的苦力工人，名叫阿金，我和他很能谈得来，很有感情，后来我教新文字就是从他那里开始的。到那里不久，我便认识了世界语学者周庄萍先生，我本是世界语爱好者，相见恨晚。约5、6月份，垣曲县“垣民之友”案发生，涉及北平、太原、运城，特别是垣曲当地的干部、教员很多。我在上海，家里人知道，垣曲官方也知道。不得已，为了防止意外，我又急急忙忙地离开养鸭厂，搬到市内中山路原大夏大学附近的季家库这个闲人、学生、居民、失学失业青年杂居，而当局不注意的避风港。在这里，有我、杜松寿、郑竹逸、伟伦、李锦章、力群等人。这里竟成为我常住的一块宝地，也是我们这些革命者活动的根据地。